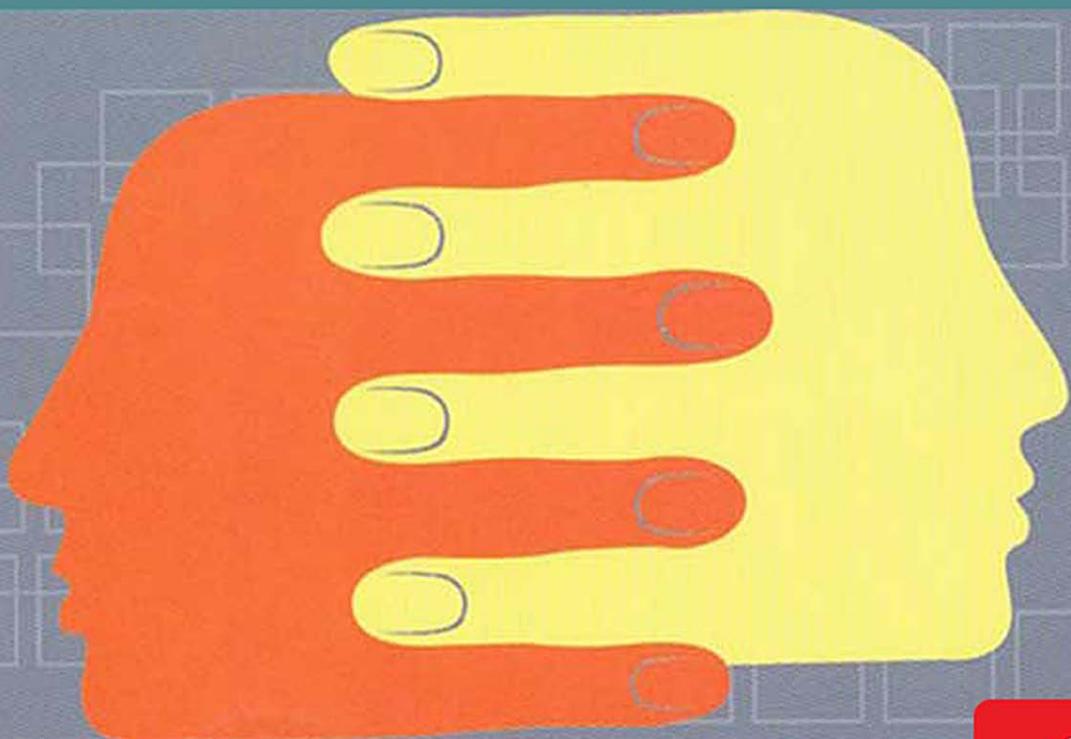


东晋南朝时期王谢家族诗赋研究

孙晶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文丛·一般资助项目”

东晋南朝时期王谢家族诗赋研究

DONGJIN NANCHAO SHIQI WANG-XIE
JIAZU SHIFU YANJIU

孙 晶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引 言

第一章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

第一节 博学能文、多才多艺的创作群体

第二节 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

第三节 品评切磋、同题共咏的创作风气

第四节 渐趋整炼、益事妍华的赋作风貌

第二章 “去饰取素”与谢灵运辞赋审美观的玄学色彩

第一节 “去饰取素”与“判身名之有辨，权荣素其无留”

第二节 “去饰取素”与“映红葩于绿蒂，茂素蕤于紫枝”

第三节 “去饰取素”与“欣见素以抱朴，果甘露于道场”

第四节 “去饰取素”与玄学领域的“言意之辨”

第三章 《山居赋》等汉魏六朝大赋的药石药草类物象

第一节 汉魏六朝七体赋与药石药草类物象的疏离

第二节 汉晋都邑赋玉石草木之境中的药石药草类物象

第三节 本草学的发展与托配仙人的汉晋都邑大赋

第四节 谢灵运《山居赋》铺举药石药草类物象的意义

第四章 南齐谢朓前期辞赋的主旋律

第一节 谢朓《七夕赋》等前三赋创作时间考

第二节 幕僚游宴主题的传达：《七夕赋》

第三节 宋玉赋风传统的回归：《拟风赋》

第四节 幕僚式的奉和赋：《高松赋》

第五章 南齐谢朓诗赋互文性初探

第一节 互文性理论与谢朓诗赋互文性的类型

第二节 《酬德赋》与沈、谢诗赋的互文性

第三节 《临楚江赋》与谢朓诗文的互文性

第四节 体裁互文性与对谢朓赋论的新观照

第六章 《文选》与王谢家族诗歌

第一节 《文选》所收谢灵运诗歌的特点

第二节 《文选》所收谢玄晖诗歌的特点

第三节 《文选》所收琅邪王氏家族诗歌的特点

第四节 《文选》所收王谢家族诗歌的缺憾

第七章 《玉台新咏》与王谢家族诗歌

第一节 《玉台新咏》所收王谢家族诗歌情况表

第二节 《玉台新咏》收录琅邪王氏家族诗歌的特点

第三节 《玉台新咏》所收陈郡谢氏家族诗歌特点

第四节 《文选》与《玉台新咏》所录王谢家族诗歌之异同

第八章 近代文论领域之陶谢论

第一节 近代文论领域的尊陶之风

第二节 近代文论领域的崇谢之论

第三节 近代文论领域对陶谢诗境的互释性观照

第四节 近代论陶评谢中的微词异响

第九章 新世纪谢灵运诗赋研究述评

第一节 文本、思想等多重视角的谢灵运诗歌研究

第二节 旅游、家族等文化视角的谢灵运诗歌研究

第三节 谢灵运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

第四节 别开生面的谢灵运辞赋研究

附录一：《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

附录二：笔者校点[清]·陈元龙《历代赋汇》所收王谢家族辞赋情况

附录二：《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收录东晋南北朝王谢家族别集
情况

主要参考书目

后 记

引 言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中唐刘禹锡的诗句总是令人情不自禁地浮想起东晋南朝时期王谢家族虽已风流云散的前朝往事。本书的研究对象就是东晋南朝时期王谢家族之诗赋，这是中国古代文学领域中比较传统的研究对象，也是本人出版拙著《汉代辞赋研究》之后，逐渐展开的另一段研究里程中的主要研究对象。

有关王谢家族诗赋，前人及时贤已有不少研究成果，尤其是对王谢家族作家中最重要的诗人谢灵运的研究方面，成果颇富。为了解国内外学术界的研究动态，也为本书的写作少做重复性工作，我撰写了《新世纪谢灵运诗赋研究述评》，总结了新世纪谢灵运诗赋研究的特点，分别从文本、思想等多重视角的谢灵运诗歌研究，旅游、家族等文化视角的谢灵运诗歌研究，谢灵运与其他诗人的比较研究，

别开生面的谢灵运辞赋研究等几大方面梳理了新世纪谢灵运诗赋研究的主要成果，认为新世纪的谢灵运诗赋研究给我们带来欣喜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更多的启示和思考。首先，有关谢灵运诗歌研究的成果很多，也很有特点，这对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古代文学优秀作家作品的研究很有意义。一些研究成果还能从当代文学史研究的角度对谢灵运诗歌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很有当代意识，也很有价值。不过，相关专著的数量明显与学术论文领域的热闹景象不相契合，谢灵运诗歌研究还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其次，谢灵运山水诗虽然是谢灵运诗歌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重要论题，涌现的成果很多，然而，一些论文对谢灵运山水诗、对陶谢诗歌差异的研究，仍有屋下架屋，重复研究或人云亦云之感。对谢灵运文集中除五言诗以外的各体诗歌的研究还比较少，未来的谢灵运诗歌研究还可以从新的角

度推出新的成果。第三，比较文学视野下的谢灵运诗歌研究仍可继续加强。“文化交流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动力之一”，^①在对谢灵运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进一步开阔视野，加强谢灵运诗歌与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第四，相对于人们更加关注谢灵运诗歌的局面来说，学术界对于谢灵运辞赋的研究仍可进一步深入。谢灵运在赋学方面的贡献比较大，这既体现在他重视赋的创作，又体现于他对赋的编纂和整理。然而，新世纪谢灵运诗歌与辞赋研究仍处于极不平衡的状态。新世纪以来有关谢灵运辞赋研究的论文有近30篇，仅占谢灵运诗赋研究论文总数的约十分之一。第五，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古代诗、赋、骈文、散文、小说等文体发展演变的重要时期，而新世纪以来有关谢灵运辞赋特征的论述较少，谢灵运辞赋在赋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也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关注，这对探讨魏晋南北朝辞赋文体演变来说，还是有缺憾的。总的来说，当代学术界对谢灵运诗赋的研究已达到了很高的层次，许多研究论文思维的缜密，作者学养的深厚，学术水平的上乘以及学术研究的感悟和灵性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必将进一步促进新世纪以后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开展。

本书在对谢灵运诗赋总体研究状况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撰写了第二章、第三章以及第八章的内容。第二章《“去饰取素”与谢灵运辞赋审美观的玄学色彩》，论述了陈郡谢氏家族最有影响的文学家谢灵运独特的辞赋审美观。认为受魏晋玄学思潮影响，谢灵运在《山居赋序》中提出的“去饰取素”与其赋序中同时提到的“意实言表”“遗迹索意”一样具有浓厚的玄学色彩，其内涵复杂微妙。总体风格上的“废张、左之艳辞”而取“朴素自然”是其表层含义；审美鉴赏上的“超越辞藻形式”而取“心境的素朴”是其深层含义。大谢归隐始宁而玄佛仙兼融的心灵世界又丰富了“去饰取素”的玄理内涵，也使《山居赋》的玄理指向有别于西晋以来的其他玄言赋。第三章论谢灵运《山居赋》等汉魏六朝大赋的药石药草类物象，由于谢灵运《山居赋》铺举药石药草类物象在本草学和文学领域都中都特别，因此这一章探究了包括《山居赋》在内的汉魏六朝

^① 季羨林《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序》，李岫、秦林芳主编，《二十世纪中外文学交流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版本下同）。

大赋对药石药草类物象的铺举描绘情况。发现大赋中的七体表现出与药石药草物象疏离，但七体同时又罗列了一些传统食文化意义上药食同源类草木物象；汉魏六朝都邑大赋常常是在类聚山川，毛举草木之时，杂以药石药草类物象，并常常托配仙人；谢灵运《山居赋》设单独一节铺举药草物象，列专门段落叙寻药石药草，有采药救颓之意，具有本草学和植物学方面的价值，也丰富了山水文学的表现内容。本书第八章主要研究近代文论领域对谢灵运与陶渊明文学创作的评论和阐释情况，陶谢论也是近代文论领域中一个比较有趣的话题。本章认为近代尊陶之风中对陶渊明诗文不平之气的认同，可与以冲淡自然论陶渊明诗文的主调相抗衡；近代崇谢论多与谢灵运诗歌艺术的创新以及清代以来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合一的倾向有关。受传统诗论和近代思潮影响，近代陶谢论有陶谢并提、互文互释的特色，已暗合西方互文性理论。近代陶谢论在文论史观的建构、哲学美学视野的开拓上已初步表现其在近现代文论体系中的价值。在一些诋斥六朝之风的评论中，亦可见对陶谢诗尤其是对谢诗评论的微词异响。

王谢家族作家中另一位重要诗人是谢朓，学术界已有专著和论文专门研究谢朓的诗赋，但对谢朓前期辞赋、谢朓诗赋关系的探讨还可深入，谢朓个别作品的解读也还有争议，因此本书第四章专门研究南齐谢朓前期辞赋，对谢朓《七夕赋》等前期三赋创作时间进行了考释，认为谢朓《七夕赋》传达的是幕僚游宴的主题；《拟风赋》是对宋玉赋风传统的一种回归；《高松赋》为幕僚式的奉和赋。第五章借鉴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互文性理论，阐释谢朓诗赋互文性问题，进而解读谢朓有争议的辞赋作品。纵观谢朓的文学创作，其诗赋之间很明显具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谢朓诗赋文中有两组关系非常密切的作品值得我们注意：A. 谢朓《酬德赋》与谢朓、沈约之间的互赠诗歌；B. 谢朓《临楚江赋》与谢朓供职荆州西府前后的诗歌和骈文。这两组作品或以水平互文性为主或以垂直互文性为主，构成各自的话语空间。谢朓A组和B组作品中都有诗和赋，每组作品中的单篇作品都是其他作品的互文本，也是谢朓体物写情的有效载体。由谢朓诗赋这种互文性，我们可以从体裁互文性的角度分析这些诗赋在差异性的叠合方面所表现出的一些特点，并审视谢朓赋论的内涵。

东晋南朝时期谢氏家族诗赋成就很高，而“文学名位照耀江左”^①的琅邪王氏家族在诗赋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学术界关于琅邪王氏家族诗歌方面的研究成果较多，而把琅邪王氏家族辞赋作为整体研究对象的还不多见。因此本书第一章对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家族的辞赋创作进行了分析和研究，文中密切结合文献典籍中有关琅邪王氏家族辞赋创作情况的记载，分析东晋南朝时期琅邪王氏辞赋创作的总体特点，指出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显示了琅邪王氏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作家大多博学能文、多才多艺，善于运用辞赋的形式表现作家的艺术体验。受家族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少作家具有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具有渐趋整炼、益事妍华、丽而不淫的发展趋向，他们的辞赋作品堪称文辞典丽，甚至一时称美，辞赋作品的题材内容及表现上都有一定的独特性。不过从总体上看，至南朝时期琅邪王氏大部分辞赋作品所用体式稍显单调，形式上没能突破诗赋之间的界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在声律、辞藻方面艺术才能的发挥，这也是他们流传后世的辞赋名篇数量不及谢氏、萧氏家族的重要原因之一。尽管如此，琅邪王氏辞赋作家仍以具体的辞赋创作显示了辞赋在六朝文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显示了内质散文化的骈体赋在当时的生命力。

书中第六、七章在文献收集与整理的基础上，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分别论析现存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古的两部文学总集《文选》与《玉台新咏》收录王谢家族诗歌的特点，肯定《文学》《玉台新咏》收录这些诗歌的文献价值和文学史价值。同时，也以两部总集中所录王谢家族诗歌为例，分析说明东晋南朝以来诗歌题材、篇幅、声律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王谢家族诗歌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审美倾向，王谢家族诗人在诗歌创作方面，有时统领风骚，有时各领风骚。而从《文选》和《玉台新咏》对王谢家族诗歌的收录情况看，这两部总集对王谢家族不同诗人的诗歌收录情况是非常不平衡的。《文选》收谢氏家族诗歌较多，达72篇，是所收琅邪王氏家族诗歌数量的9倍。而《玉台新咏》收琅邪王氏家族诗歌较多。徐陵编，吴兆宜注、程琰删补，穆克宏点校的《玉台新咏》

^①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中华书局2007年版（版本下同），第369页。

收录的可以确认为琅邪王氏家族的诗歌共计 34 首，比所收录的谢氏家族诗歌多 7 首。虽然《玉台新咏》《文选》有共同收录的王谢家族诗歌，如王微《杂诗》（思妇临高台）、谢惠连《七月七日咏牛女》（《文选》作《七月七日夜咏牛女》）、谢惠连《捣衣》、谢朓《同王主簿怨情》（《文选》作《和王主簿怨情》）、谢朓《铜雀台妓》（《文选》作《同谢谿议铜雀台诗》），但也仅有这 5 首为两部总集重合的作品，这 5 首作品相对于《玉台新咏》所收王谢家族诗歌总数 61 首来说，所占比例较小，不足十二分之一。因此，可以说，从收录王谢家族诗歌的情况看，《玉台新咏》与《文选》所收录的作品在内容与风格上也形成了一种互补之势。这两部文学总集对于了解南朝时期文坛上对王谢家族诗歌的接受和重视程度，以及当时选家的审美倾向等均具有重要意义。

“多点探视与集中精力拿下一领域”，是本书遵循的主要研究思路。“惟有多点探视，才能对这一领域的多侧面有所了解；又惟有集中精力拿下一个领域，而非东一榔头西一棒，才能有一个系统全面的成果。”^① 这是博士后导师王钟陵先生的谆谆教诲。然而，拙稿限于本人学识，继以项目结项的紧迫压力，还远远未能达到导师所说的高度，仅以此面貌呈现于世。

附录一收录了论文《在古典赋论与近代赋论之间——论清人刘熙载的赋学批评》，这是笔者进行本项目研究期间撰写的一篇关于刘熙载赋学批评的论文。附录二为笔者校点[清]·陈元龙《历代赋汇》所收王谢家族辞赋的情况，使用繁体字，列出校点陈元龙《历代赋汇》所收王谢家族辞赋的情况。附录三为《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收集东晋南北朝王谢家族别集的情况，是笔者在收集王谢家族诗赋文献过程中对《中国丛书综录》《中国丛书广录》收集东晋南北朝王谢家族别集情况的整理。供有兴趣的读者查阅。

^① 王钟陵：《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大学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444 页。

第一章 东晋南朝望族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

晋室南渡后，陈郡谢氏、琅邪王氏地位最为显赫。他们既是官僚世家，也是文学世家。琅邪王氏“爵位蝉联、文才相继”^①，他们的文学创作除诗文之外，辞赋的创作也是值得注意的。在霍松林先生主编的《辞赋大辞典》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六朝时期的17位王姓辞赋作家中，琅邪王氏辞赋作家就有13人，即王廙、王羲之、王彪之、王凝之、王珣、王韶之、王徽、王俭、王僧虔、王融、王僧佑、王筠、王锡13人。此外《南史》《宋书》《梁书》中还明确记载了王素、王彬、王暕、王规这几位琅邪王氏作家的辞赋创作情况，但未收入这部大辞典中。

虽然在史书和辞典中我们可以看到琅邪王氏辞赋家云集的情况，但琅邪王氏辞赋家的很多辞赋作品并没有被完整地保存下来。明人张溥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中曾叹王筠之作未能流传于世时说：“沈隐侯之知王元礼，犹蔡伯喈之知王仲宣，当日两人情好相得，诗文互赏，郊居住佳句，惟元礼能读，好诗弹丸，非隐侯莫为知音也。隐侯遗文颇广，元礼则寥寥鲜存，无论洗马以来诸集断阙，即传中所称《芍药赋》与草木十咏，俱归乌有。因叹治乱异数，彼此一时，国门洛下之书，空井寒灰之泣，其文传不传，亦各有命也。”^②张溥感叹沈约、王筠俱为当时名噪一时的文人，然王筠之作品却不能像沈约作品那样流行于后世。今天看来，如果从整个家族的声望和影响看，虽然，王筠个人的辞赋作品未能尽如人愿地保存下来，但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在当时的影响却是千载之下仍不能隐

① 李延寿：《南史》卷二十二，第2册，中华书局1975年版（版本下同），第611页。

② 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第308页。

没的，他们的辞赋创作活动是六朝时期辞赋创作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具有家族延续性，也有文学创作上的前后相续性，从一个重要的侧面显示了琅邪王氏文学创作上的成就。

第一节 博学能文、多才多艺的创作群体

琅邪王氏作家群体的博学能文是令琅邪王氏作家们引以自豪的，并在当时就已得到认可。如南朝梁时王筠在与诸儿书论家门集时说：“史传称安平崔氏及汝南应氏并累叶有文才，所以范蔚宗云崔氏雕龙。然不过父子两三世耳，非有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集，如吾门者也。”^①梁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也称：“自宋武爱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自明帝以下，文理替矣。尔其缙绅之林，霞蔚而飙起：王、袁联宗以龙章，颜、谢重叶以风采；何范张沈之徒，亦不可胜也。盖闻之于世，故略举大要。”^②刘勰也指出王、袁、颜、谢几家人才“龙章风采”、文学才能大盛的情况，而且首提琅邪王氏家族的人才。

值得注意的是琅邪王氏家族的辞赋作家们不仅博学能文，而且多才多艺，多数王氏辞赋家具有多方面的艺术才能。其中书法是琅邪王氏的家传艺术，名家高手代有所出。书圣王羲之“尤善隶书，为古今之冠，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③王羲之之父王旷亦善草书，其叔父王廙是过江东之后，王羲之之前最有名的书法家。王僧虔《论书》中曾说：“王平南廙，右军叔。过江，右军之前以为最。”^④《晋书·王廙传》又云：“廙少能属文，多所通涉，工书画，善音乐、射御、博弈、杂伎。”^⑤王僧虔则“雅善隶书”，“雅好文史，解音律”，

① 《南史》卷二十二，第2册，第611页。

②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卷九，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版本下同），第675页。

③ 房玄龄等：《晋书》卷八十，第7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版本下同），第2039页。

④ 《南史》卷二十二，第2册，第604页。

⑤ 《晋书》卷七十六，第7册，第2002-2003页。

“颇解星文”。^①王僧佑则“雅好博古，善《老》《庄》，不尚繁华，工草隶，善鼓琴”^②王筠叔父王彬，好文章，习篆隶，时人为之语曰：“三真六草，为天下宝。”^③从史书记载的有关情况看，琅邪王氏辞赋家不仅有文学才能，书法艺术也堪称一流。不仅如此，还有的擅才绘画，妙解音律、善鼓琴、射御、博弈、杂伎等，琅邪王氏辞赋家确实是多才多艺，具有较高的文学艺术修养。

这种文学艺术修养对琅邪王氏的辞赋创作也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尤其王氏赋作中有关书法赋的出现，如王羲之《用笔赋》，王僧虔《书赋》，极能体现王氏辞赋家艺术上的修养，是六朝赋坛上王氏辞赋创作不同于其他赋家的地方。赋史上用赋描写书法艺术的第一篇作品是西晋杨泉的《草书赋》，开始描写书法艺术，但只限于草书体。赋中称赞草书“惟六书之为体，美草法之最奇”，^④并运用了大量的比喻描写草书艺术给人的审美感受，不过，还没有个人性情的流露，没能把草书的任意挥洒与作者个性结合起来。而至东晋王羲之《用笔赋》则以一种艺术家的审美态度，表现出尺幅千里、飘云矫龙的气势和美感。王羲之《用笔赋》见载于宋代朱长文所辑《墨池编》及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或疑为伪作，但这篇作品流传已久，影响深远。因此，在没有确切材料证明其为伪作的情况下，我们暂定其为王作。王羲之《用笔赋》描写了两种书体笔法，一是“高强劲实”的“真体”，“藏骨抱筋，含文抱质。没没汨汨，若蒙泛之落银钩；耀耀晞晞，状扶桑以挂朝日。或有飘飘骋功，其若自然，包罗羽客，总括神仙。李氏韬光，类隐龙而怡情，王乔脱屣，歛飞鳧而上征。”^⑤不仅写出了真体正作“高强劲实”“藏骨抱筋”的基本特点，而且把道家、神仙家所推崇人物的风姿神采与书法艺术的出神入化联系起来，盛赞了真体用笔自然天成的艺术境地。二是写笔势威而不猛，龙飞凤舞的“草体”，尽情描写了草体笔锋的变化：“游丝断而还续，龙鸾群而不诤。发指冠而皆裂，据纯钩而耿耿，忽瓜

① 《南史》卷二十二，第2册，第600—603页。

② 《南史》卷二十一，第2册，第580页。

③ 《南史》卷二十二，第2册，第611页。

④ 欧阳询：《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版本下同），第1266页。

⑤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版本下同），第1580页。

割兮互裂，复交结而成族。若长天之阵云，如倒松之卧谷。时滔滔而东注，乍纽山兮暂塞。射雀目以施巧，拔长蛇兮尽力。草草眇眇，或连或绝，如花乱飞，遥空舞雪，时行时止。或卧或蹙，透崇华兮不高，踰悬壑兮非越。”^①比之杨泉《草书赋》用“宛转翻覆，如丝相持”^②的概要描述更丰富，更充满灵动之气。赋末紧承前文气势，盛赞了书法艺术“信能经天纬地”的作用，“毗助王猷，耽之玩之，功积山丘。吁嗟秀逸，万代嘉休，显允哲人，于今鲜俦”，表现了书法“共六合而俱永，与两曜而同流，郁高峯兮偃盖，如万岁兮千秋”^③的穿越时空的艺术审美效果。王羲之把对自然山水的鉴赏、体悟渗透到用笔时的精神体验中，表现出一种性情与怀抱的寄托，使这篇描绘书法的作品成为这类作品中洒脱不拘、不类常流之作。王僧虔则是王氏家族中善隶书的书法家，也是书法理论家，著有《论书》《为飞白书题尚书省壁》等。史载宋文帝见其书素扇，叹曰：“非唯迹逾子敬，方当器雅过之。”^④“太祖善书，及即位，笃好不已。与僧虔赌书毕，谓僧虔曰：‘谁为第一？’僧虔曰：‘臣书第一，陛下亦第一。’上笑曰：‘卿可谓善为自谋矣。’”^⑤可见王僧虔对自己书法艺术的钟爱程度。其《书赋》主要叙述心手相应的书法技巧，如“情凭虚而测有，思沿想而图空，心经于则，目像其容，手以心麾，毫以手从”，“故其委貌也必妍，献体也贵壮，迹乘规而骋势，志循检而怀放”。^⑥从赋的风格上看，灵动之气不如王羲之《用笔赋》，但对书法创作时的“风摇挺气，妍靡深功”，“沉若云郁，轻若蝉扬，稠必昂萃，约实箕张，垂端整曲，裁邪制方”^⑦的精神境界和体悟之功描写得比较深刻。琅邪王氏辞赋家所作的这些论书法的赋作既包含了他们对书法艺术的深刻理解，也展现了他们的精神境界，又从一个重要的方面体现了琅邪王氏辞赋创作的独特性。

① 同上。

②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下册，第1267页。

③ 《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第2册，第1580页。

④ 萧子显：《南齐书》卷三十三，第2册，中华书局1972年版（版本下同），第591页。

⑤ 《南齐书》卷三十三，第2册，第596页。

⑥ 《艺文类聚》卷七十四，下册，第1267页。

⑦ 同上。

第二节 主动献赋、润色鸿业的赋颂意识

据《晋书》《南史》《南齐书》等史料记载，王氏家族创作了不少颂美类的赋作。如东晋时期的王廙曾作《中兴赋》，歌颂东晋前期王朝中兴的局势，还曾作《白兔赋》，称扬符瑞，颂扬晋室。至齐武帝起旧宫，王彬献赋，文辞典丽。齐武帝数阅武，王僧佑作《讲武赋》，今仅存赋目。梁天监十二年，改造太极殿毕，王规有《新殿赋》。至于齐世祖襖饮芳林，使王元长所为的《曲水诗序》，也是有名当世的作品。清人何焯说：“序记杂文遂与辞赋混为一途，自此作俑。”^①王融此序在齐梁时颇负盛名，据《南齐书·王融传》记载，北魏使者以为它胜过宋颜延之的同题之作，还说：“昔观相如《封禅》，以知汉武之德；今览王生《诗序》，用见齐王之盛。”^②王融奉命所作的《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乃歌功颂德之作，实是骈偶化的赋体之序。

这些作品的出现与琅邪王氏家族文化传统有关，琅邪王氏家族能够“与时推迁，为兴朝佐命，以自保其家世”^③。魏晋时期琅邪王氏的代表人物王祥在其所著训子孙的遗令中曰：“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史载“其子皆奉而行之”^④。东晋南朝时期政治形势复杂，因此琅邪王氏以门户至上，重视家族兴衰，往往能在六朝政权频繁更替中与时推迁，为新朝佐命，为新朝歌功颂德。同时，由于琅邪王氏的政治身份高于一般的士大夫，因此他们润色鸿业的自觉意识也更为强烈。如王廙上《中兴赋》时曾说：“臣托肺腑，幼蒙洪润，……昔司马相如不得睹封禅之事，慷慨发愤，况臣情则骨肉，服膺圣化哉！又臣昔尝侍坐于先后，说陛下诞育之日，光明映室，白毫生于额之左，相者谓当王有四海。又臣以壬申岁见用为鄱阳内史，七月，四星聚于牵牛。

① 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卷五，第11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87年版，第14页。

② 《南齐书》卷四十七，第3册，第821—822页。

③ 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54页。

④ 《晋书》卷三十三，第4册，第989页。

又臣郡有枯樟更生。及臣还京都，陛下见臣白兔，命臣作赋。时琅邪郡又献甘露，陛下命臣尝之。又骠骑将军导向臣说晋陵有金铎之瑞，郭璞云必致中兴。璞之爻筮，虽京房、管辂不过也。明天之历数在陛下矣。臣少好文学，志在史籍，而飘放遐外，尝与桀冠为对。臣犬马之年四十三矣，未能上报天施，而讐负屡彰。恐先朝露，填沟壑，令微情不得上达，谨竭其顽，献《中兴赋》一篇。虽未足以宣扬盛美，亦是诗人嗟叹咏歌之义也。”^①可见王廙作此赋宣扬盛美的意图。《南齐书·王俭传》也记载了王俭类似的做法：“上曲宴群臣数人，各使効伎艺，褚渊弹琵琶，王僧虔弹琴，沈文季歌《子夜》，张敬儿舞，王敬则拍张。俭曰：‘臣无所解，唯知诵书。’因跪上前诵相如《封禅文》。上笑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堪之。’”^②

当然，琅邪王氏辞赋家用赋文宣扬盛美也与魏晋以来辞赋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有关。马积高先生曾说：“魏曹丕开始提出‘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未若文章之无穷’的观点。其所谓文章，包括所有的成章的文字著述，自亦包括辞赋”，“左思、皇甫谧均以诗六义之一的赋为辞赋之赋所自仿，即含有推尊辞赋的地位和作用之意。孙绰更进一步，认为《三都》《二京》为‘五经鼓吹’，葛洪甚至认为《毛诗》不及司马相如等人的赋之更富华采。沈约说屈、宋、贾、马之作‘英辞润金石，高义薄云天’，亦推尊备至。……《北史·魏收传》载魏收常云：‘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唯以章表碑志自许，此外更同儿戏。’讲的虽只是辞赋作用的一个主面（即表现作者才能），亦可见魏晋以来辞赋在文人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比两汉还要高。”^③对于魏晋以来赋坛的这种情形，万光治先生则分析道：“由于文人无法摆脱角色意识的困扰，在汉赋独擅文坛的时期，它的纯文学的价值和地位，也没有得到文人充满自信的认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赋虽失去了往日梦幻般的虚荣，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公正待遇，是赋文学历史上境况最好的时期。”^④琅邪王氏辞赋家以赋为

① 《晋书》卷七十六，第7册，第2003—2004页。

② 《南齐书》卷二十三，第2册，第435页。

③ 马积高：《历代辞赋研究史料概述》，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80—83页。

④ 之瑜：《首届国际赋学术讨论会综述》，《山东师大学报》1990年第6期。

颂美当朝统治者的方式，也正是他们肯定辞赋价值的表现，他们已把包括辞赋在内的文学作品看作是推行教化的重要工具。所谓“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经纬乾坤，弥纶中外，故知文之时义大哉远矣！”^①琅邪王氏作家主动选择辞赋作为颂美的方式是视辞赋为正宗的文学观念的反映，也是对汉代班固《两都赋序》中所提出的“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②的辞赋观念的继承。虽然这时期的颂美之赋更多倾向于宣上德，粉饰太平的成份更多一些，但这也是辞赋地位在六朝辞赋作家的具体创作中得到正视的反映，因此这样的作品在辞赋文学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三节 品评切磋、同题共咏的创作风气

在魏晋南北朝的文坛上，品评切磋和同题共咏的创作风气是比较引人注目的，这种风气也出现在琅邪王氏辞赋家的创作活动中。品评切磋需要参与的作家具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审美鉴赏力，与同题共咏的创作活动一样，都是作家才情的一种表现。《世说新语·文学》《南史》《梁书》等典籍中记载了琅邪王氏辞赋家所参与的有关辞赋创作的品评切磋之事。如《世说新语·文学》载：“桓宣武命袁彦伯（即袁宏）作《北征赋》，既成，公与时贤共看，感嗟叹之。时王珣在坐，云：‘恨少一句，得“写”字足韵当佳。’袁即于坐揽笔益云：‘感不绝于余心，泝流风而独写。’公谓王曰：“当今不得不以此事推袁。”^③《世说新语校笺》中引《续晋阳秋》曰：“宏从温征鲜卑，故作《北征赋》，宏文之高者。”^④王珣赏读袁宏《北征赋》，但已从赋作的气脉上敏锐地感觉到赋中换韵上的不足。袁宏文学才力雄贍，当即补写，因此文坛上传为美谈。从中可见，在东晋时代，人们就已非常关注赋中的用韵问题了。至南朝梁沈约与王筠也在诗赋创作上进行了品评切磋。《南史·王筠传》云：“约于郊居宅阁斋，请筠为草木十咏书之壁，

① 《晋书》卷九十二，第8册，第2369页。

② 萧统：《文选》卷一，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1页。

③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44页。

④ 同上。